

治理择校乱象：“上榜”城市不能再手软

□本报评论员 刘文宇



那些对改革抱着“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地方,那些停留于“徒陈空文、等待观望”的地方,该醒醒了,该有所行动了。19个大城市,比拼已经开始,观众期待各位选手能跑出好成绩。

“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100%的小学校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日前,继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后,教育部瞄准19个大城市,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其2014年制订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要求各市提出有针对性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努力破解择校难题”。这19个大城市包括北京等4个直辖市、深圳等5个计划单列市和哈尔滨等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

治理小升初择校乱象终于排出了时间表,还不客气地点了19个大城市的名,这一消息对不少家长来说,既喜出望外,又有几分将信将疑。

因为多年来,类似的通知连连下发,但一次次“雷声大雨点小”,个别地方择校乱象甚至持续升温,舆论的指责、公众的不满充斥网络报章。有人总结,在北京,想上一所好初中,有门路的“拼爹”,有财力的“拼钱”,没

权没钱的只能“拼命”,即家长逼着孩子“占坑”、上奥数、学特长。看看小升初培训业务成为多少教育类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营收入,看看有多少小学高年级学生周末睡眠惶惶奔波于一个接一个的培训班,就可知小升初竞争有多惨烈。

在多年的煎熬与焦虑中,家长们急切盼望政府出手治理择校乱象,但他们一次次失望而归。“本地情况特殊”、“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等层层成为借口。家长们在摇头叹息中渐渐失去了对相关部门的信任与期待。

这次点名19个大城市,且排出今后3年实现免试就近入学时间表,终于让公众看到告别择校乱象、回归义务教育本义的曙光,看到地方政府部门尊重法律、依法行政的姿

态。

翻翻《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不是选拔

培养“尖子生”、面向少数人的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儿童的公益性、普惠性、保障性的国民素质教育,依靠特殊政策打造“牛校”,将学校及学生分出三六九等,逼着家长及孩子陷入择校怪圈挣扎,严重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原则和教育规律。无论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还是以优择校,都在破坏教育公平,加重学生负担,人为拉大社会差距,污染社会风气。

之所以不惜文字重申义务教育的原则,实在是个别地方“走得太远”了。个别“牛校”可以将校庆办进人民大会堂,可以将运动会办到鸟巢,而且以此为荣,这暴露出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校际间的巨大差距,不仅不是什么值得炫耀之事,相反则是义务教育畸形发展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所追求的教育“政绩”,大大背离了义务教育的初衷与真谛。而问题迟迟得不到治理,似乎又给

了某些地方“这事没办法解决”的“底气”。

治理择校乱象,这事有多难?安徽铜陵、辽宁盘锦、河北邯郸、山西晋中等地经验显示,清除择校怪胎,并非比登天还难。在北京,试行学区制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的举措,也赢得不少叫好声,道理是一个道理,告别择校,让孩子就近入学,各地缺的不是办法,是决心。

这次点名和倒排时间表,可谓打响治理义务教育择校乱象的“起跑枪”。在这个运动场上,参赛选手是19个大城市的市长、教育厅长及中小学校校长等,观众和裁判是广大市民,包括新闻媒体,那些对改革抱着“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地方,那些停留于“徒陈空文、等待观望”的地方,该醒醒了,该有所行动了。19个大城市,比拼已经开始,观众期待各位选手能跑出好成绩。

从晒“三公”到晒“三十公”的进步轨迹

□王石川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委员欧阳知,是市人大监督政府“钱袋子”的主推者。在他的推动下,人大监督政府“钱袋子”有了更“硬”的法律依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监督预算办法》在2月18日召开的广州市两会上表决通过。欧阳知称,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单位津贴、各种补助,将不再是秘密;另外,公众看到的将不仅是常说的“三公”了,而是接近三十个“公”,比如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公共开支的所有费用,在“款”这级,就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前不久,湖南冷水江市公务员工资意外见光,引来舆论热议。通常,公众想知道公务员工资,却难以遂愿。有大学生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的工资,以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被拒。在晒“三公”渐渐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公众有了新的渴望:除了“三公”,还想知道其他“公”的情况,比如公务员的工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近6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越来越大,步子也越来越大,但仍有一些地方对该保密的信息进行保密,如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单位津贴和各种补助等。有句话说得好,让人民知道的真相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安全。细而言之,政府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才更便于公众行使监督权。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前提。

不同于以往的道德呼吁或行政命令,广州市正要推行的晒“三十公”,是依照《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监督预算办法》的法律硬性要求,是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如今,该办法在广州市两会顺利通过,相关条款得以保留,广州市直政府部门将在今年下半年晒出按经济分类的决算账本。进而言之,这是人大监督政府花钱的制度安排,具有刚性和强度,该公开而不公开,该详细公开而不详细公开,就属于违法了。

财政预算被称为百姓的“钱袋子”,掌握在政府手中。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监督预算执行等工作,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盯紧钱袋子,政府部门才无法乱花钱、也不敢乱花钱。要打造“廉洁、节俭”的政府,离不了透明财政,这就需要健全有关制度的监督体系,发挥人大的监督力量。

从晒“三公”到晒“三十公”,这是一次艰难的挺进,却是大势所趋。



“不差钱”

广西警察枪杀孕妇案,政府前期代赔73万元;青海湟中城管队长打伤孕妇,政府先赔付20.9万元……据《法制晚报》报道,近期,连续几起公职人员伤人事件的善后处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记者整理了近年来10起公职人员违法事件,发现事件发生后,有八成左右由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先行赔偿。

“政府代赔”可以保证及时安抚受害者家属、第一时间息事宁人,却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对违法犯罪者的惩戒效应。当然,对有些事件,政府在其中确有管理失职等责任,有些则是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确实缺乏相应的赔偿能力。在名誉维护、利益保障等多重考量下,政府代赔自有其合理性,但代赔标准和原则则不能打马虎眼,相应的信息公开及事后追偿更不能跟着和稀泥。要知道,这是用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在填窟窿,就算窟窿暂时堵上了,当事人该担的责任却不能就此逃掉。

□赵青青/图 辑超/文



“疏通关系”比“床照”更值得关注

□张贵峰

近日,网民李姗姗实名发帖举报河南省人大代表罗志元包养情妇、遗弃私生女,通过疏通关系获取人大代表资格。李姗姗自称是罗志元的情人,两人因抚养费闹翻,帖子中公开了与罗志元在床上的照片等。日前,河南鹿邑县委宣传部回应称,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将依据调查事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见2月17日《新京报》)

又见“二奶反目”式情妇反腐。如果举报属实,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罗志元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确有进一步调查追究的必要,如

“包养情妇”、“私生女”等问题。因为依据《代表法》,人大代表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但是,考虑到罗志元作为企业家——“河南志元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主要社会身份,我们的关注点显然不宜过分聚焦于“香艳”的男女关系问题,而更应集中于“通过疏通关系获取人大代表资格”的问题。

对于这位企业家来说,即便“包养情妇”属实,这样的斥资“包养”,也与类似的政府公职人员“包养情妇”,不可简单同日而语。前者一般只是个人私生活范畴的私德问题,涉及的也

主要是民事纠纷;而后者则与公权力的廉洁性存在直接关系,势必涉及“权钱、权色”等腐败权力交易。

真正该追问的是,罗志元“通过疏通关系获取人大代表资格”的举报如属实,该“疏通关系”的具体内幕是什么,其中是否存在贿选等涉嫌“破坏选举”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选举中,通过贿选等方式“疏通关系”的现象并不罕见,其中企业家往往正是贿选的重点人群。在此背景下,罗志元的“疏通关系”,更加值得深入追查,它关乎公权力、公共利益,关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持卡人、营业员、供货方联手中饱私囊 武汉:公务消费卡可以提现 10%回扣成“潜规则”

市民呼吁加大查处力度,尽快堵上管理漏洞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现象少了,但利用职务消费的情况却依旧存在——今年春节期间,记者在武汉市场发现,使用公务消费卡提现现象十分普遍,并形成10%回扣的“潜规则”。

在当地一些大型商场、酒店、加油站,记者均遇到有人提醒“可以用公务消费卡提现”。从相关操作流程来看,这项业务已“相当成熟”。

近日,记者在一大型购物商场购物时,就碰到一名热情的营业员,主动推荐记者用公务消费卡购物。这名营业员直言:“这样做,不仅可以买到比卖场便宜的商品,还可以把卡

内资金提现。”

为了做成交易,营业员把操作流程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一遍:营业员收卡后,会留下持卡人的联系方式;持卡人消费后,可以当场拿走所购商品。营业员则事后通过现金交易,套取客人卡内余下的金额,通过把公务消费卡交商场收银平账,再通知持卡人来提取卡内余下的现金,而营业员则收取10%的手续费作为“回扣”。

记者随后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整个过程中营业员和商品供货方形成合作关系。供货方的业务人员不通过商场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将商品提供给营业员,省去了商品在商场运行过程中的费用,商品价格可以有30%左右的折扣。这样一来,用公务卡消费者就能和营业员一起分享这30%左右的好处,营业员和供货商的业务员再分配帮助顾客套现的10%回扣。记者了解到,做这种生意的大多是高档商品柜台,营业员往往会凭经验判定顾客身份。据一名商场工作人员透露,经验丰富的营业员一般每天可以成交3笔以上。

类似的情况,记者在另一家加油站也碰到过。当记者询问加油员被发现后怎么办,加油员表示“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他说,自己靠帮顾客套现一天可以拿到上百元回扣。

据一位从业者介绍,目前在武汉利用公务消费卡套现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通过

加油卡提现的大多是党政机关的司机和相关业务管理人员;在商场用公务消费卡提现的多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酒店用公务消费卡提现的各种情况都有,签单月结的尤其严重。并且无论谁参与套现,大家都不会进行讨价还价,而经办人获取10%的回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实行公务消费卡本来是政府管理公务消费,防止滥用公款等行为的一项措施,现在却被他们利用管理上的漏洞,变成中饱私囊的一种新方法!”采访中,武汉很多市民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些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并采取措施堵上这个漏洞。

“择校热”能否真降温

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她和身边的部分家长都希望不要取消“小升初”考试。“我对小孩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相信她能通过考试进入理想的学校,如果取消这个考试,等于把我们的希望掐灭了。”

治理择校乱象不能光靠“末端治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说,只有真正做到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硬件软件的公平,“零择校”才是理智的,而不是强制的。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成都市的城乡均衡教育始于2003年。十年来,成都累计投入近200亿元对城乡中小学实施了一系列建设改造,同时加大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使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悬殊差异得到根本性扭转,办学质量得到不断提升。

通过一系列举措,成都小学、初中教学质量的校际差异、城乡差异明显缩小。由成都市政府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成都市小

学教学质量的校际差异系数仅为0.04,初中减小到0.33。2011年成都市主城区部分小学学校择校生占新生比例下降17%,包括公立名校在内的部分初中学校下降41%;2012年,这一数据在原有基础上保持稳定。

天津从促进义务教育学校高水平均衡发展着力点,推进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硬件水平,使每所学校都达到现代化学校标准。同时采取联合学区发展模式、中小集团化办学改革试点及骨干教师的流动输出等措施,使各学校之间的软件水平得到均衡发展。

“治理择校乱象不能光靠‘末端治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治本”之举包括:一是努力增加教育投入,义务教育法定支出不留缺口;二是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扶持发展一批民办学校,满足群众多样性教育选择;四是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让各个初中学生有公平选择机会。

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次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应该是要为小升初的学生以及家长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政策保障。这项政策保障,在这19个城市最终将如何落实,我们拭目以待。(新华社北京2月19日专电)

天津市级机关24小时开门服务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时限不超3天

本报讯(记者姜明 通讯员姜书范)“市级机关24小时开门服务,办理时限不超过3天,这回我们办事更方便了。”近日,一位民营企业办事人员手里拿着天津市机关公布的服务电话高兴地说。天津市委、市政府开展“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活动,党政机关24小时开门服务,向社会公开专线电话、网址和服务人员名单,随时接听和受理企业群众反映的问题,限期研究答复,办理时限原则上不超过3天。

据介绍,活动从春节过后持续到8月底,将成立32个市级服务工作组,深入工商企业促进改革发展、深入工程项目促进建设运营,深入万企促进转型升级为重点,开展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活动。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举行会谈

(上接第1版)

习近平表示,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中方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在同周边国家交往时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近年来,中国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各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务实合作成效显著,整体关系不断提升。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实现和解,赞赏巴方为缓和巴印关系所作努力。

侯赛因表示,巴方愿继续同印方进行对话,改善关系。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出席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双方代表,并见证了会议纪要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中巴战略与经济合作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侯赛因举行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出席。

车站针对前来买票的老人较多的情况,在每个售票窗口都配置了老花镜。益阳火车站设候车室、售票大厅备有轮椅和专门用来与聋哑旅客“交谈”的纸和笔,怀化火车站成立“银发志愿队”,组织30余名退休铁路职工每日到车站服务旅客。

负责客车车辆检修的广州、株洲、长沙车辆段全力提高检修效率和质量,一周时间内检修列车达1万余列8万余辆。株洲机务段组织100名党员骨干成立了打冰扫雪应急小组,全力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科技窝案”是怎样发生的

□王贲

广东省科技行政系统正在迎来一场人事地震——据广东省纪委近日通报,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可埭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去年该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后,该系统又一名落马的厅级官员。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广东科技行政系统腐败涉案人数已逾50人。(见2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去年至今的反腐风暴中,形形色色的老虎的“垮掉”已经不再鲜见,但一省一个系统内涉案人员上至“一把手”、下至基层官员,涉案企业既有知名高科技企业和上市公司,也不乏新生小公司,无论是涉案人员的数量还是案件涉及面,它都令人触目惊心。或许正因如此,媒体在报道时再次用了“窝案”一词。

“窝案”是怎样发生的?一个习惯性的看法是,与科研相关的职能部门往往是清水衙门,是腐败的难于衍生之地。但从报道内容来看,这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一位接近广东科技系统的人士告诉记者,广东科技系统官员出事,多与科研经费的发放和产学研项目有关,科技厅等单位既掌握着产学研项目的评审权,又决定着专项科研补助资金的发放,早就存在着权力寻租空间。在跑项目拿补助依旧充满竞争的科研背景下,如果有高校或企业想从中“胜出”,自然就会去采取行贿、分成等种种不正当手段,科研腐败也因此出现。

一个人的腐败,我们可以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但一个省级科研管理系统的不堪一击,更多验证的是地方科研管理体制本身存在“阿喀琉斯之踵”。关于此,观察者早有指出:当下不少地方的科技管理机制不是按照基本的科研规律来运行,而是以封闭的权力为中心来运作。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该系统内某些官员乃至是普通行政人员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日常运行机制封闭,就不免缺失最基本的外部监督,让腐败容易发生。

如今,国家对科研领域的公共资金投入日益增多,地方科研管理者手中的分配权力亦在同步增大,因此对其管理导向的纠偏就尤需提速。将科研经费的裁定与分配完全脱离行政管理,或是呼吁一部专门的科研经费使用法迅速出台,暂时都难以兑现。当下最重要的纠偏路径,一是要注重科研资金的投入—产出效应,在支持基础研究和战略性研究外,经费的发放要以项目的可能市场产出值为标准;二是要加大对经费发放与使用的刚性监督。

不管怎样,对广东科技窝案不必过于莫名惊诧。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案讲述的依旧是“寻租的腐败规律与故事”:腐败高发与具体的行业其实不存在特殊关联,只与权力和公共资金的过度集中、严重缺乏监督息息相关。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